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王贤艺¹, 莫伟豪^{1*}, 方朝成², 巩元勇¹

¹攀枝花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四川 攀枝花

²攀枝花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四川 攀枝花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正快速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学生画像、AI助教等技术在提升教育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算法推送可能窄化学生的价值视野, 人机交互正在稀释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 学生对AI的依赖正在弱化独立思考能力。这些现象的背后, 是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坚守的育人逻辑之间的错位。本文从交往行动理论、规训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规律出发, 系统分析了这种错位的表现、根源与应对思路。研究认为, 走出困境的关键不是拒绝技术或盲从技术, 而是清醒地认识技术的边界, 在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关系重构等方面系统发力, 让技术真正服务于育人。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思想政治教育, 交往行动, 规训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mpow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Xianyi Wang¹, Weihao Mo^{1*}, Chaocheng Fang², Yuanyong Gong¹

¹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²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贤艺, 莫伟豪, 方朝成, 巩元勇.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对策[J]. 教育进展, 2026, 16(9): 1238-1244. DOI: 10.12677/ae.2026.1692016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rapidly penetrating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 classrooms, student profiling, and AI teaching assistants have enhanced educational efficiency, yet they have also introduced new challenge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ay narrow students' value horizon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s diluting the affective bond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tudents' reliance on AI is weakening their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thinking. Underlying these phenomena is a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that governs AI and the educational logic that underpi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rawing up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 theory of discipline, and the internalization-externalization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root causes, and potential responses to this misalignmen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key to overcoming this predicament lies neither in outright rejection of nor blind submission to technology, but rather in a clear-eyed recognition of its boundaries, coupled with systematic effort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capacity building, and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so that technology genuinely serves the goal of stud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cative Action, Disciplin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进入产业振兴深耕阶段,农业发展全面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与生态并重。随着农业生态化与产业化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1],国家相关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2],为新时期农业发展确立了多目标协同的总体基调。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科技农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转型的重要方向。

然而,在政策强力推动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审视:当算法推荐替代教师进行内容筛选,当人机交互稀释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当学生对AI的依赖日益加深——效率的提升究竟服务于谁?有研究发现,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使用AI生成答案而绕过思考,一些课堂的行为监测系统让学生学会了“表演认真”而非真实参与[3][4]。这正是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坚守的育人逻辑之间结构性错位的现实表征。

这不是技术恐惧,而是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并非中性的工具介入,而是一场涉及知识筛选权、师生关系结构和学生主体性养成的深层变革。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方向,相关政策明确要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并推进人工智能全阶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5]。与此同时,国家正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6],教育部亦将“用好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确立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战略抓手。然而,政策层面的积极推动与教育实践中的深层隐忧之间,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技术以提

升效率之名介入育人过程，效率本身是否反而遮蔽了育人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价值观念塑造，这需要教育者在对话中理解学生，在真诚交往中传递信念，在实践中促成价值内化。这些教育环节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前提，无法被数据优化或算法替代。为此，本文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的规训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规律，审视人工智能进入思政教育所带来的深层挑战，并探讨应对思路。

2. 技术嵌入的三重嬗变

人工智能进入思政教育，带来的不只是工具更新，而是整个教育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缓慢的、隐性的，但影响是深远的。以下从“内容－关系－主体”三个递进层面展开分析。

2.1. 内容之变：算法推荐对知识传播的重构

传统的思政教育，内容的选择和呈现主要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来决定。教师知道学生需要学什么，即使某些内容暂时不感兴趣，也会通过教学设计来引导他们进入。而算法的逻辑是“投其所好”——根据用户过往的行为数据，推送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这种逻辑在商业领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如果照搬到思政教育中，就会出现問題。学生只接触他们原本就认同的观点，认知视野逐步收窄；而那些需要一定理解门槛、但真正重要的理论内容，因为“完读率”低而被算法边缘化。这不是技术故障，而是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的结构性错位。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错位的性质。他区分了两种社会行动：以成功为导向的“工具行动”和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工具行动关心的是“如何最有效地达到目标”，它追求效率、可计算、可优化。交往行动关心的是“如何达成相互理解”，它需要真诚、信任、对话和时间。思政教育从根本上说属于交往行动——它不是为了高效地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在师生之间达成价值共识。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工具行动的最佳载体——它擅长计算最优解，但不擅长理解人心。当工具行动的逻辑被不加反思地应用于交往行动的场域，就会出现错位。算法推荐追求的是“用户停留时长”，而不是“价值观是否内化”；智能答疑追求的是“快速给出答案”，而不是“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2.2. 关系之变：技术中介对师生信任的替代

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学生愿意听老师的课，往往不是因为老师的课件做得多漂亮，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老师是真诚的、关心他们的。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逐渐积累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种关系。智能答疑系统可以24小时在线回答学生的问题，自动批改系统可以快速给出分数，情绪识别软件可以“诊断”学生的心理状态。这些技术的初衷是好的——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效率。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在减少。当学生的问题可以被AI随时解答，他们向老师请教的意愿可能会降低；当系统可以“读懂”学生的情绪，老师主动关心学生的动力可能会减弱。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校引入了课堂行为监测系统。学生的抬头率、表情变化、互动频次被量化成数据。这套系统的逻辑是：好的课堂应该有高的抬头率、积极的表情、频繁的互动。于是，学生开始学会“表演认真”——做出符合系统预期的行为，而内心并未真正参与。福柯的规训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犀利的视角。他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暴力来实施，而是通过监视、分类、规范化来“规训”个体[7]。学生被置于持续的数据凝视之下，他们不再是为了理解而学习，而是为了“被系统判定为认真”而表演。这种“表演性学习”一旦成为常态，思政教育就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品质：真诚的对话和真实的思想碰撞。

2.3. 主体之变：技术依赖对独立思考的弱化

思政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学生自己去阅读、思考、辨析、表达。正是在困惑中挣扎、在错误中修正、在反复中深化，知识才能转化为信念。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常说的“内化－外化”规律。内化是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吸收为内在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认同；外化则是将内在的信念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表现[8]。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学生的主体性参与——主动思考、主动质疑、主动实践。

但生成式 AI 的普及正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当学生面对一个开放性问题时，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去查找资料、组织观点、论证立场——只需要把问题输入 AI，几秒钟就能得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答案。有学者指出，相当比例的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时会直接使用 AI 生成的答案，而不做任何修改或思考[3]。这种方式看似高效，实际上绕过了内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长此以往，学生可能逐渐丧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论证观点的能力。他们变得善于“得到答案”，却不善于“寻找答案”。

以上三个层面——内容的筛选方式、关系的互动模式、主体的能力养成，构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侵蚀链条。技术首先改变了学生接触什么(内容)，然后改变了他们如何与教师互动(关系)，最终改变了他们自身如何思考和成长(主体)。这不是三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个结构性错位的不同表征。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技术应用始终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这一根本目标。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技术越发展，越不能偏离育人的根本方向。

2.4. 理论整合：技术权力的双重作用

上述三重嬗变并非孤立现象，其深层机制可借助哈贝马斯与福柯的理论加以整合理解。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数据监测技术(如课堂行为识别、学习痕迹追踪)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权力——学生被置于持续的数据凝视之下，他们的抬头率、表情变化、互动频次被量化、分类、规范化。这种权力不再依赖外部强制，而是通过“可能被随时看见”的潜在监视，促使学生将外部规范内化为自我规训，从而产生“表演性学习”：他们不再为了理解而参与，而是为了被系统判定为“认真”而做出符合期待的行为。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概念揭示了更根本的错位：思政教育本属于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领域，但当算法推荐、智能评测等技术工具的逻辑(效率、可计算、控制)全面侵入时，交往行动被工具行动所取代。师生之间本应通过真诚对话达成的价值共识，被简化为数据指标(如正确率、完成度)的优化。这种“殖民”直接阻碍了价值内化过程——内化需要主体在困惑、质疑、反思中主动建构意义，而工具逻辑追求的是快速给出“正确”答案，绕过思辨环节。由此，福柯的规训权力解释了学生行为层面的异化(表演性)，哈贝马斯的殖民理论则揭示了价值层面内化受阻的结构性根源。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技术逻辑对育人空间的全面支配，正是思政教育面临深层挑战的理论本质。

3. 效率逻辑与育人逻辑的结构性张力

上述三个层面的变化——算法推荐与价值引导的错位、人机交互对师生关系的替代、技术依赖对学生主体性的侵蚀，表面上看是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的根源是同一个：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效率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坚守的育人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效率逻辑追求的是：更快、更准、更省力。它关注可量化的指标——学习时长、答题正确率、互动频次、抬头率。育人逻辑追求的是：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它关注的是不易量化的东西——价值观是否内化、信念是否坚定、判断力是否提升。效率逻辑倾向于简化问题，把复杂的教育过程拆解成一个可计算的任务。育人逻辑必须面对人的复杂性——同一个道理，不同学生的理解方式不同；同一个问题，不同情境下的处理方式不同。效率逻辑希望找到“最优解”，育人逻辑知道没有“标准答案”。

问题不在于效率逻辑本身是坏的——它在很多领域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当效率逻辑被不恰当地应用于育人场域，当技术逻辑开始替代而不是辅助教育逻辑，错位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技术无意识”或“逻辑置换”：我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技术自带的行为准则，用技术是否“好用”来替代教育是否“有效”。比如，为了提升“抬头率”这个指标，课堂活动被设计得更热闹，但热闹不等于思考深入。为了提高“互动频次”，系统鼓励学生频繁发言，但发言多不等于收获大。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指出，技术理性不是中性的，它携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效率、控制、量化。当技术理性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它就开始“统治”人[9]。这一洞见在今天仍然有效。当 AI 进入思政教育，如果技术理性的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教育就可能从“培养人”变成“优化人”——把人变成可以被计算、被预测、被控制的客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些正在发生的现实。

4. 应对路径

面对上述挑战，需要的是清醒的认识和务实的应对，而不是极端的态度——既不必全盘否定技术的价值，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下方向值得认真考虑。

4.1. 确立价值对齐原则，重构内容供给的逻辑

“价值对齐”本是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概念，指确保 AI 系统的行为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将其引入思政教育，意味着算法推荐、内容生成、学生画像等技术应用，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政教育目标为基准，而不是以“用户偏好”或“流量数据”为基准。

《“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1]。落实这一原则，需要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内容供给的价值审核制度，任何拟在思政课堂中使用的智能推荐系统，其算法参数必须嵌入主流价值导向，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核心内容在推荐池中占据优先权重；二是算法运行的透明与可审计制度，建立算法决策的留痕机制，定期对推荐结果进行价值偏离检测，防止“流量逻辑”侵蚀“育人逻辑”。为进一步落实价值审核制度，可初步设计如下操作框架：成立由教育专家、伦理学家、技术人员、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算法伦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思政内容的核心价值标签库，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优先权重；要求算法推荐系统在内容池构建阶段即嵌入标签体系，确保核心内容的推荐概率不低于预设阈值；同时建立月度偏差检测机制，通过随机抽样对比推荐结果与价值基准，发现偏离超过 5%即启动人工干预和参数调整。

4.2. 明确人机协同边界，修复师生交往的空间

技术可以辅助教学，但不能替代教育。在人机协同的实践中，必须划清技术应用的边界：AI 负责数据处理、资源筛选、初步反馈等事务性工作；教师聚焦于价值引领、深度辅导、情感沟通等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育人活动。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为师生面对面交流保留制度空间。合理安排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比例，避免“屏幕”完全取代“课堂”。智能答疑系统的定位是“辅助”而非“替代”——它可以处理常规性问题，但重要问题、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引导学生与教师直接沟通。二是审慎使用课堂行为监测技术。如果量化监控(抬头率、表情识别等)导致学生产生“表演性”行为，就需要调整使用方式或寻找替代方案。技术应用应以“增强而非替代师生互动”为准则。三是建立“教师最终决定权”制度。在学生价值观评价、思想动态判断等关键环节，教师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权，不能完全交给算法。

4.3. 培养批判性认知，强化师生智能素养

技术越是发达，人的判断力越重要。应对技术依赖的根本之策，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教师的

智能引领能力。

对于学生，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技术的批判性认知。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或专题讲座，帮助学生了解 AI 的基本原理、优势和局限。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 AI 生成内容的审视能力——不盲从 AI 给出的答案，学会追问“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设计“AI 观点辨析”教学活动：教师提供一段由生成式 AI 输出的关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的论述，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分析该论述中是否存在价值偏向、逻辑漏洞，并与教材中的经典论述进行对比，最后教师引导总结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和批判使用的方法。通过这一活动，学生能直观感受 AI 输出并非客观中立，从而培养审视和质疑的习惯。在课程设计中，应明确哪些任务可以使用 AI 辅助、哪些任务需要独立完成；对于可以使用 AI 的任务，要求学生同时提交思考过程的记录。

对于教师，需要帮助他们完成角色转型。教师培训的重点不应只是学习如何操作软件，而应当是：如何在 AI 辅助的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作用[10]。《“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制定教师智能素养标准”“分层分类开展人工智能素养培训”[1]。应将智能素养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必修内容，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帮助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价值导航员”和“人机协同的主导者”。

5. 结语

人工智能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技术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手段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价值引导、师生关系、学生主体性等方面的深层挑战。这些挑战的实质是技术逻辑与育人逻辑的错位。

本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分析，缺乏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数据支撑，如学生使用 AI 的行为习惯、教师对技术应用的真实态度等，后续可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加以补充。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快速演进，通用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新的未知挑战，有待持续跟踪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 + 教育”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政策文件强调“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将这一政策理念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清醒地认识技术的边界，坚守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关系重构等方面系统发力，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育人，而不是让育人迁就于技术。

基金项目

2024 年攀枝花学院思政文化专项课题“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探究”(项目编号：2024SZYB004)。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604/t20260410_1433240.html, 2026-04-10.
- [2]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2026-04-16.
- [3] 何炉进. 智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措施[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2): 159-164, 171.
- [4] 郭宇嘉, 相玉红.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挑战与对策[J]. 大学, 2025(24): 7-10.
- [5] 丁奎岭. 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J]. 数码设计, 2025(11): 14-16.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6.

- [7] 赵朝晖, 孙忠福. 福柯规训思想与学校规训教育——以《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为底本[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9(6): 79-85.
- [8] 骆郁廷.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9): 128-137, 160.
- [9]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32-135.
- [10] 刘歌.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升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2024.